

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與展望

畢英賢

〔本文為作者向第十四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至十四日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舉行）所提論文，特予選載，藉供參考——編者〕

蘇聯中國問題專家、現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 (M. S. Kapitsa) 於七十年代末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十年，三種政策」，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中(共)蘇關係作出了概括。他說，中共在其存在的三十年中，所走的道路是：首先是「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昨天是「帝國主義」的僕從和預備隊，而今天實質上已經充當了「國際反動與侵略力量」的突擊隊^①。賈丕才對中共外交政策所作的評斷，雖然含有強烈的主觀意見，但是就中(共)蘇關係的實際演變看，也不無道理。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以來，中共的對外政策曾經歷過數次劇變。隨著中共對外政策的轉變，其對蘇關係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概略言之，五十年代內中共對外政策的特徵是，親蘇仇美，六十年代，既反蘇也反美；七十年代內，繼續反蘇，但逐漸與美國接近。進入八十年代後，中共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是，同時改善對美國和對蘇聯的關係。五十年代初，中共一面倒向蘇聯，固然是由於中國共產黨與蘇共的組織關係、歷史淵源，但是也由於時勢所逼情非得已^②。五十年代底，中共政權已把軍事力量納入中央政府統一控制之下，在近代中國，這是罕有的成就^③；同時，經濟獲得相當改善，中央集權政治控制漸趨鞏固。就當中共自覺羽毛漸豐之際，蘇共修改了馬列主義的若干基本教條，同時進行貶史達林運動。於是

註① M. S. Kapitsa, *KNR: Tri desyatielitya-tri politiki* (PRC: Three Decades-Three Policies) (Moscow: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y literatury, 1979), p. 573.

註② 「胡耀邦答日本記者」，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第三頁。

註③ A. Doak Barnett,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p. 74.

，中共起而反對，而形成所謂意識形態鬭爭。在整個六十年代中，中共與蘇聯由於意識形態之爭，而導致經濟關係惡化、軍事合作終止、兩黨關係斷絕，最後釀成邊界流血衝突。於是，蘇聯不斷增加駐在中蘇邊界附近的兵力，致使中共感到「蘇聯威脅」。

六十年代底，中共「文革」逐漸收場，國內政策漸趨溫和。在外交上，中共一面緩和同蘇聯的緊張關係，一方面試圖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以確保自身安全。此際，恰好美國意圖利用中共制衡蘇聯在亞洲的軍事力量，並欲透過中共解決越南問題^④，而展開與中共的接觸。七十年代內，中（共）美關係「正常化」順利推展，而中（共）蘇關係並無顯著改善。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共）美正式建交，中共已經達成對美外交政策中最主要的目標。於是，回過頭去同蘇聯「關係正常化」。以下擬檢視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展開，探究雙方對關係正常化所持的基本立場與主要圖謀，研判各自採取的策略，總結中（共）蘇關係正常化已獲得的進展，最後蠡測中（共）蘇關係發展的前景。

關係正常化的起步

中（共）蘇關係正常化從何時開始，很難精確的認定，但是有一件事對北平莫斯科關係演變極富歷史意義，那就是：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中共決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予延長。中共宣佈，中（共）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保持並發展正常關係」，同時向蘇聯政府建議，舉行談判，以解決雙方懸而未決的問題^⑤。中共的建議立刻為蘇聯所採納。事實上，自從中（共）蘇關係惡化之後，蘇聯曾多次向中共建議，舉行談判以改善相互關係^⑥。中共始終相應不理。

在中（共）蘇條約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終止效力之前，中共與蘇聯都希望通過談判，尋求一個新的相互關係架構。於是，中共代表團於一九七九年九月抵達莫斯科進行談判。但是，這個談判一開始就枝節橫生，首先在議事日程上發生爭執。蘇聯主張採取較小規模的議事日程，以雙邊關係為主。蘇聯認為，政府間關係正常化需要一些雙方共同協議的原則，作為法律的基礎，並載之於適當的文件上^⑦。中共主張採取較廣泛的議程，討論事項不局限於雙邊問題，應擴及蘇聯的對外政策^⑧。在首次談判中

註④ William E. Griffith, *Peking, Moscow and Beyond* (Washington, D. C.: CSIS, 1973), p. 3.

註⑤ [大公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第一頁。

註⑥ Raisa Mirovitskaya and Yuri Semyonov,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Press, 1981), pp. 79-80.

註⑦ I. Aleksandrov, "Naperetok istoricheskoi pravdy" ("In Defiance of Historical Truth"), *Pravda*, December 8, 1979, p. 4.

註⑧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四頁

，中共表示，中（共）蘇關係若要正常化，蘇聯必須：（一）把駐在中蘇邊界的五十多個陸軍師減少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十二個師；（二）從外蒙撤退所有的蘇軍；（三）停止支持越南佔領高棉^⑨。這個談判並未產生具體結果，但決定於次（一九八〇）年在北平舉行第二輪談判。一九七九年底，蘇聯進兵阿富汗。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中共宣佈，蘇聯入侵阿富汗，造成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新障礙，「在這種情形下不適用於舉行中蘇談判」，因此予以中斷^⑩。

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正常化談判雖然中斷，但雙方實際關係已逐漸改善。進入八十年代之後，中共否定「文化革命」、審判「四人幫」，評判毛澤東的功過。這些都有利於中（共）蘇關係的改善。同時，中共開始大力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和平環境。這些都使中共願意再度與蘇聯進行談判。然而，談判之門是中共自己關的，必須有人敲門，中共才能重新開門而不失面子。這個敲門人就是當時的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他在一九八二年三月鄭重向中共聲明，蘇聯願意同中共改善關係^⑪。

實際上，布里茲涅夫的聲明，是蘇聯官員、學者、專家不同意見的折衷和總結。在對中共關係上，蘇聯強硬派多屬黨官，以拉赫馬林（O. B. Rakhmanin）^⑫等為首，他經常用鮑里梭夫（O. Borisov）筆名發表著述。這一派認為，中共對內政策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夠多，對外政策仍以僵硬的反蘇、聯合資本主義國家為主^⑬。因此，他們對中（共）蘇改善關係並不熱衷，其理由是：第一，蘇聯如果同中共關係正常化，將會鼓勵其他共黨政權採取更加獨立的立場。第二，可能助使中共強大，形成對蘇聯的軍事威脅。第三，可能助長蘇聯內部貶史達林（de-Stalinization）勢力的復活^⑭。

主張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溫和派，其成員多屬外交官員，以契赫文斯基（S. L. Tikhvinsky）及賈丕才（M. S. Kapitsa）

註⑨ [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頁。

註⑩ [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第一頁。

註⑪ "Rech' Tovarishcha L. I. Brezhneva" ("Brezhnev's Speech"), *Pravda*, March 25, 1982, p. 2.

註⑫ 拉赫馬林 (Oley Borisovich Rakhmanin)，一九二四年生，歷史學博士，有教授頭銜，一九八一年當選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八年起，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共產黨與工人黨聯絡部」第一副部長。

註⑬ 參閱 O. Borisov, *Iz istorii Soverskko-Kitaiskikh Utnosheniy (From the History of Soviet-China Relations)* (Moscow: Mezhdunarodnie otnosheniya 1981), pp. 1-8.

註⑭ Gilbert Rozman, "Moscow's 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4, (June, 1983), pp. 237-238.

⑤等爲首，賈丕才有時用筆名烏克蘭柴夫(M. S. Ukrainsev)發表論著。他們認爲，中共內部雖然有右傾現象，「但並未失去社會主義基礎」，中共與美國的反蘇結合終將瓦解⑥。他們主張與中共修好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共內政已轉回蘇聯模式。第二，中共對外政策逐漸含有較多的獨立性，已降低了七十年代反蘇的程度。第三，蘇中(共)改善關係可影響中共內部政策，強化親蘇勢力，延緩其軍事現代化的速度。第四，與中共改善關係，蘇聯可把較多的資源用於改善人民生活⑦。顯而易見，布里茲涅夫以該派論點爲基礎策訂了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方針。同時，賈丕才與契赫文斯基也成爲這一政策的實際推行者。

另一方面，中共領導階層及學者之中，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似乎也有正反對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國大陸上自由表達意見的機會比蘇聯更小。例如，從蘇聯進兵阿富汗到中共宣佈「中斷」談判，相隔二十多天，顯而易見，有兩種不同見解相持不下，難以得到迅速的結論。中共的學者專家們，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問題表示反對意見的不多。由於改善同蘇聯的關係是中共官定路線，可以推論，學者之中反對此一路線的人可能多於贊成者。易言之，多數學者們寧願看到中共傾向西方，而不願中(共)蘇和好。在中共統治下，沉默不是贊成，而是反對。有一名在美國從事研究的中共學者，用化名在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上發表文章說，中共緩慢而謹慎地緩和同蘇聯的緊張，是由於三項國內的基本發展。第一，政府中的保守派地位已獲改善。第二，中共不願依賴西方。第三，爭取和平建設環境⑧。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表示，「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⑨。這裏所謂對中共安全的威脅，包括：(一)蘇聯在中蘇邊境和外蒙古部署的重兵，(二)蘇聯支持越南佔領高棉，(三)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這就是中共後來經常所提起的「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三個主要障礙」。同時中共宣佈，今後將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決不依附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在這一方針下，中共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勢必採取平行外交，既不明顯偏向美國，也不明顯偏向蘇聯。

註⑤ S. L. Tikhvinsky 是蘇聯資深漢學家，任蘇聯外交學院院長，「蘇中友好協會」實際領導人。M. S. Kapitsa 亦爲漢學家，並在外交部工作，現任蘇外交部副部長。

註⑥ 蘇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古道希尼可夫博士(Dr. Gudoshnikov)在接受日本記者訪問時作此說明，參見，*Japan Times*, February 15, 1981: p. 1. 另外，蘇聯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員Boris Zanegin，曾對西方作相同的表明，參見，*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8, 1982, p. 22.

註⑦ G. Rozman, *op. cit.*, pp. 238-239.

註⑧ Edmund Lee, "Beijing's Balancing Act", *Foreign Policy*, No. 51, (Summer, 1983), p. 29.

註⑨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大公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第六、七頁。

在這個背景下，蘇聯雖沒有從阿富汗撤兵，中共却同意恢復談判。不過，中共把「談判」一詞改為「磋商」，仍是副部長級的。一九八二年十月，舉行第一回合磋商。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程再度正式展開。

關係正常化的進展

在北平與莫斯科正式展開談判或磋商之前，當若干觀察家尚在預測中（共）蘇關係能否改善之際，它們相互關係的改善實際上業已發生，祇是未被世人發覺，正如中（共）蘇關係公開決裂之前，爭執早已在暗中進行一樣。在這種逐漸改善關係之初，沒有相互訪問，沒有聯合公報，因此不易被世人發覺^②。事實上，直至雙方關係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談判或磋商才有可能。即使阿富汗事件對這個關係正常化過程也未產生嚴重的影響。

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磋商已經輪流在北平及莫斯科兩地舉行了六個回合，雙方皆未透露磋商的詳情，但雙方共同指出，「自磋商開始以來，在互利的基礎上兩國在經濟、貿易、科學、文化和體育等領域中的聯繫和交往有所增加」^③。除此而外，雙方官員接觸的級別業已提升，中蘇邊界平靜無事。

從七十年代末到目前為止，雙方皆未報導任何邊界糾紛事件，邊境緊張早已降低。克里姆林宮曾經一度爲了炫耀兵力而頻頻在邊界附近舉行的軍事演習已經少見，而邊界平常發生的零碎問題，可以有較好的機會，通過談判以合理方式尋求解決^④。更具有深刻意義的是，中共承認，蘇聯在亞洲的某些軍事力量主要是對付美國和日本的^⑤。另一方面，莫斯科不斷提醒中共，必須合作共同對付美國在東亞日漸升高的威脅。

莫斯科告誡中共，美國在遠東、太平洋，也在中國大陸邊緣，設立了三百多個軍事基地及其他軍事設施；同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對中共同樣有威脅性。因此，蘇聯自稱有權利對美國的政策採取相應的措施並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過程，這些措施「既符合蘇聯的、也符合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利益」^⑥。同時，蘇聯促請中共注意，臺灣的戰略地位確立了臺灣在美國政策中的角

註^② Roy Medvedev, "The USSR and China: Confrontation or Detente?", *New Left Review*, No. 42, (December, 1983), pp. 16-17.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五頁；[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註^④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頁。

註^⑤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頁；「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第十六頁。

註^⑥ I. Alekseev, F. Nikolaev, "O nekotorykh tendentsiyakh v politike KNR" ("On Some Tendencies in PRC's Policy"), *Mezhdunarodnaya*

Zhizn', No. 11, (1984), p. 34; A. A. Gromyko, *Leninskii Kursom Mira: Izbrannye rechi i stat'i* (Leninist Course of Peace: Selected Speeches and Articles) (Moscow: Politizdat, 1984), pp. 492-493.

色。對美國而言，臺灣是亞洲重要軍事政治基地之一，是美國太平洋前線的中心點，可用以確保對海參崴至新加坡之間各亞洲海峽的空中優勢。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不會有重大的改變。相反的，蘇聯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始終堅持原則，一直不變，認為中共對臺灣有「不能剝奪的權利」^⑳。所以，蘇聯在遠東的軍事措施對中共不構成任何威脅，僅是抵禦美國的威脅。中共國際戰略研究會會長伍修權桿鼓相應地說，美國仍有人「明裏暗裏在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㉑。

中蘇邊界直接貿易站的開放，也是雙方邊界平靜無事的佐證。一九八三年夏，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宣佈，中蘇三個邊境貿易站在關閉二十年後重新開放，兩個在西北的新疆境內，另一個在東北的黑龍江省。在一九八四年中，雙方邊境貿易進展迅速。同年九月，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訪問了內蒙古自治區邊境地區。他在邊防部隊會報時說，多年來中蒙邊境相安無事，邊境小城二連浩特將對外開放，所謂「南有深圳，北有二連」，形成兩個重要「窗口」^㉒。依照雙方協定，今（一九八五）年新疆對蘇貿易將增加兩倍。黑龍江對蘇貿易亦逐年增加，今春曾在蘇聯遠東邊區舉行黑龍江出口商品展^㉓。

在中共與蘇聯間，近幾年來，經濟、貿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的交流活動愈來愈多。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雙方幾乎完全斷絕這類往來。這些活動在雙方人民中間慢慢地製造了相當程度的友好氣氛。

雙方貿易額於一九五九年達於最高峯，超過二十億美元，一九七〇年降到最低點，祇有四千多萬美元^㉔。其後，維持在二億到三億美元之間。最近幾年內，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一九八四年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六十，總值九億七千八百萬盧布（值十一億七千萬美元）^㉕。雙方協議，今年將提高到十八億美元左右，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三點五^㉖。此外，中（共）蘇雙方已基本上同意簽訂總額達二百億美元的五年貿易協定，其中包括中共從蘇聯購進兩臺價值二十億美元的原子能發電設備。中共副總理姚依林預定今夏訪蘇時正式簽訂此一協定^㉗。

註⑳ V. Ganshin, "Ostrov Taiwan" ("Taiwan Island") *Izvestiya*, April 27, 1984, p. 5.

註㉑ Wu Hsin-Chuan, "Relations with U.S. Soviets on Track", *Beijing*, No. 2 (Jan. 14, 1985), p. 17.

註㉒ 會建徵，「內蒙古邊境紀行：隨胡耀邦訪問散記」，「瞭望」，第四十四期（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九至十一頁。

註㉓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第三頁；「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第三頁。

註㉔ Ministerstvo Vneshnoy Forgovii, *Vneshnaya Torgovlya SSSR: 1922-1981 Foriegn Trade of USSR: 1922-1981* (Moscow: Finanso-Statistika, 1982), pp. 16-17.

註㉕ 「經濟報」(*Ekonomicheskaya Gazeta*)，第十二期（一九八五年），第二十頁。

註㉖ 「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頁。

註㉗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第一頁。

中(共)蘇政府高級官員相互正式訪問業已開始，且有提高級別的趨勢。在蘇聯與中共官員未恢復正式訪問之前，先開始了「私人性質的」訪問。一九八三年，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應邀到北平訪問，這是二十多年來中共正式邀請至中國大陸訪問的第一位蘇聯政府官員，其目的在打開接觸新渠道。一九八四年七月，中共副外長錢其琛回訪，去年十二月下旬，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Ivan V. Arkhipov)到中國大陸訪問，其意義非比尋常。第一，他是將近二十年來的第一名蘇聯高層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第二，他與中共有密切關係，五十年代內他曾以蘇聯援助中共總顧問身份在中國大陸服務，與不少中共上層領袖有私誼；第三，在他訪問期間，雙方簽署了三個文件：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以及關於成立中(共)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的協議^②。中共方面認為，阿爾希波夫這次訪問及其成果是「中蘇關係爭取正常化的新起點」。莫斯科方面則認為，這些協定一經實現，不但可以促進雙方經濟建設、提高兩國的生活水平，而且將為增進相互諒解與信任創造有利氣氛^③。

今年三月初，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爾比茨基(V. V. Shcherbisky)率團訪問美國的前夕，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正在蘇聯進行友好訪問，這是中(共)蘇兩國議會中斷交往二十多年之後的首次接觸。雙方把這次訪問視為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最重要步驟」^④。中共人大代表團，在「人大常委會」委員張承先率領下，曾訪問蘇聯最高蘇維埃，並在莫斯科、基輔及列寧格勒等地進行廣泛的晤談、訪問及參觀等活動。這次訪問至少有下列幾點特殊意義。第一，雙方接觸已發生質的轉變。按照中共及蘇聯的憲法，人代會與蘇聯最高蘇維埃是雙方最高權力機關。中共業已邀請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蘇聯已接受邀請。這種最高權力機關的代表團的相互訪問，其重要性自非普通經濟、文化等代表團可比。第二，這種訪問團與當地社會的接觸面較廣，更容易培養兩國人民間的友好氣氛。第三，這類訪問可為雙方高層政治領導互訪鋪路。

自從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過程展開後，蘇共在二十八個月內死了三任總書記，為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製造了三次「喪禮外交」的機會，對雙方關係的改善不無幫助，尤其最後一次更為突出。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死，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奔喪，在招待會上，與新任總書記握手交談，引起世界注意。一九八四年二月，安德洛波夫死，中共副總理萬里往悼，僅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G. Aliev)會晤。今年三月，契爾年科(K. Chernenko)死，中共另一名副總理李鵬前往參加葬禮。在這次葬禮外交活動中，發生幾件意義深刻的現象。第一，李鵬公開稱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肯定蘇聯是一個社會主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四頁。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第六頁。

義國家。第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向蘇共新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 S. Gorbachev)表達了「衷心祝賀」，中共新聞媒介並稱他為「同志」。第三，戈爾巴喬夫與李鵬舉行正式晤談^②。這是二十一年來，蘇共總書記第一次接見中共代表。李鵬是中共方面前途看好的政治領導人物，他與戈爾巴喬夫不僅屬於同一個時代人物，而且在同一個時期內在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③。

中(共)蘇關係的改善已經是一個確定的趨向，但是其進展的速度與程度則將視中(共)蘇雙方對關係正常化所持的立場、圖謀與策略而定。

立場、圖謀與策略

自從北平與莫斯科關係正常化過程展開後，雙方對正常化的立場雖然因時間的遷移而略有更動，但大體而言是一貫的。以下根據雙方主要言論，試歸納雙方立場的基本內涵。

在對中共關係上，克里姆林宮領導表示：(一)蘇聯願意認真地同中共改善關係；(二)同中共改善關係可以提高「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三)蘇聯建議提高雙方關係的水平與接觸層次；(四)雙方之間一如既往仍存在著嚴重政治差異，蘇聯堅持，雙方關係的改善不應損及第三國的利益；(五)蘇中(共)關係已有多方面的進展，繼續交換意見是有益的；(六)蘇聯籲請中共，共同反制由美國所發起的反共「十字軍」；(七)蘇中(共)關係改善不合某些人的心意，因為這些人想從蘇中(共)緊張關係中牟利^④。

中共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看法包括下列幾項要點：(一)中共正致力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希望有一個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環境；(二)中(共)蘇是兩個鄰邦、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兩者之間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三)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四)雙方關係已經有了發展，中共真誠地希望兩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第二頁；「消息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第三頁。

註③ 李鵬於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動力學院修電力工程；戈爾巴喬夫於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就讀。

註④ 「契爾年科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第一頁；「交換意見」，「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第二頁；「阿利耶夫會見萬里」，「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第一頁；「契爾年科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七日，第一頁；「契爾年科的講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頁；亞立克賽耶夫(I. Alekseev)，「Vazhnyi dokument v Sovetsko-Kitay skikh otnosheniih」(「Important Document in Soviet-China Relations」)，「消息報」，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第五頁；「戈爾巴喬夫的講詞」，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頁。

國關係在各個領域內有進一步發展；(b)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礙^⑳。

儘管雙方對改善關係的動機不盡相同，但雙方對關係正常化的基本立場，至少有三點是共同的。第一，雙方皆願意改善相互關係。第二，中（共）蘇都認為，彼此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分歧。第三，它們都相信，關係正常化是完全可能的、樂觀的。

中共與蘇聯銳意改善雙邊關係並且在近期內加強交流活動，有其共同戰略目標，也有其個別圖謀。

莫斯科方面的主要圖謀包括：第一，防止中共、美國與日本反蘇聯盟的形成。蘇聯認為這將是「危險的聯盟」，因此對此也非常顧慮^㉑。另一方面，中共一再表示「中國不同任何國家結盟和建立戰略關係」^㉒，可見莫斯科對此疑慮難消，而與中共迅速改善關係是最可靠的防止之道。第二，團結社會主義國家集團：至今，中共與蘇聯已經相互認同，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總書記後立刻表明，他將盡一切努力，擴大與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協同合作，提高社會主義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㉓。中（共）蘇關係的改善對兩者都有助益。第三，增進蘇聯在中（共）、蘇、美三角戰略關係中的地位，強化對美限武談判的籌碼。三月十二日，美蘇綜合限武談判業已開始，此時蘇聯表現與中共改善關係的積極傾向，無異向美國暗示，蘇聯外交在這個三角中尚有迴旋運用的餘地。第四，集中大部分力量解決國內問題。蘇聯新任總書記個人權力有待鞏固，整個領導班子已相當老化，有待過渡。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困難重重，必須大力改革。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不但可使邊境穩定無須多加顧慮，且可加強經濟貿易聯繫，取長補短。最後則是重整國際共產運動。蘇共總書記強調，蘇聯共產黨是一個國際性的黨，所以將要與「兄弟共產黨、工人黨及革命民主黨派」緊密合作，共同為「和平與社會進步」而鬪爭^㉔。中（共）蘇政治關係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後，中共與蘇共可能恢復兩黨關係，這將有助於「一切革命力量的團結」。今年初，一些共產黨主張召開共黨的國際會議，以強化「革命運動」、深刻化「兄弟黨的國際團結」^㉕。中共反對此項建議，理由不是別的，而是唯恐在當前的情況下召開國際會議，

註⑳ 「李先念彭真致唁電」，〔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第一頁；「阿利耶夫會見萬里」，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第一頁；「鄧小平談中國統一」，〔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頁；「胡耀邦談中蘇關係」，〔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第二頁；「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第十六頁；「李鵬在蘇京的談話」，〔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第二頁。

註㉑ D. V. Petrov, "Yapono-Kitayskue otnosheniya: Problemy; tendentsii" ("Japan-China Relations: Problems and Tendencies"),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 4, (1984), pp. 26-27; V. Grishin, "Opasnyi Alyans" ("Dangerous Alliance"), *Novoye Vremya*, No. 36, (1984), p. 4.

註㉒ 最近一次，係李鵬對戈爾巴喬夫所言，參見，〔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第二頁。

註㉓ 「戈爾巴喬夫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頁。

註㉔ 同註㉓。

註㉕ Ivan Hlivka, "Topical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nd Workers Movement: To Win the Struggle for Great Unity", *Brat'skaava Pravda* (in Slovan), January 8, 1985, p. 6; *FBI's Jan. 11, 1985, D1-D5*.

只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加劇分歧，加深分裂」^{④5}。

中共方面逐漸改善對蘇關係的主要圖謀包括：第一，爭取和平建設環境。中共一再聲明，其當前主要任務是從事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不但可以降低漫長中蘇邊界上的緊張，而且還可以降低軍事費用。第二，加強跟蘇聯的經濟、貿易聯繫，以加速其「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中共現代化過程中，中共一方面想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引進先進科技與設備，另一方面要從東歐特別是蘇聯引起一般設備及組件以更新現存企業。中共現有四十萬個企業，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機器設備來自蘇聯或東歐各國。因此，技術改造、改建與擴建、補充零件或組件都離不開蘇聯或東歐^{④6}。第三，標榜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改善對第三世界關係。在七十年代內，中共明顯傾向美國的外交政策，使其與第三世界關係的發展招致一定程度阻礙。八十年代開始後，中共「更加明顯地把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④7}。中共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可以改善中共在第三世界的形象。第四，解決越南問題。中共與越南衝突，使中共在第三世界聲譽受損，且增加了其軍事負擔。蘇聯與中共似乎都欲解決此一問題。中（共）蘇關係若獲重大改善，自然有利於越南問題的解決。第五，加強中共在戰略三角中的地位：在中共、美國、蘇聯戰略三角中，中共若過份或明顯偏向美國就會淪為美國的外交工具，也就是所謂的「中國牌」。中共若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則可調整它在這個三角中的地位。

由於中共與蘇聯對關係正常化所持的基本立場與主要圖謀不同，因此雙方所採取的策略也各不相同，茲分別析述於後。

先看中共的主要策略：（一）小步政策：在中（共）蘇關係改善上，中共一直採小步漸進的方法，以免引起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驚恐，其控制正常化進程的操縱桿是「三個主要障礙」，需要加速時則不提或不予強調；需要緩慢時則強調或大聲叫囂。（二）平衡發展：中共在中（共）美、與中（共）蘇關係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均衡發展，不使與某一方面發展太快。中共控制中（共）美關係的操縱桿是「臺灣問題」。（三）全方位外交：中共除與美國、蘇聯同時改善關係外，也全力改善與日本、西歐、東歐、及第三世界各國的關係^{④8}。因此，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乃是配合中共的總的對外政策。（四）避免一面倒：在美、蘇之間，中共避免對任何一方面的依賴，堅持其獨立自主政策，使美、蘇競相拉攏中共，中共可以左右逢源。

蘇聯方面的主要策略有下列幾點：（一）主動積極：蘇聯自六十年代底，已開始不斷向中共建議改善雙方關係，中共不是相應不

註④5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第一頁。

註④6 任維忠，「固定資產更新改造與經濟振興」，「紅旗」，第一期（一九八四），第三十七頁；「中國將進口東歐技術以協助改造現有企業」，「大公報」，

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第三頁。

註④7 中共外交部，「開創我國外交的新局面」，「瞭望」，第三十八期（一九八四），第八頁。

註④8 同註④7。

理，就是拒絕討論。至七十年代底，中共才作出肯定反應。(二)以經濟合作爲主要手段；莫斯科當局深知，蘇聯與中共之間的政治差異一時難以彌縫，所以先從改善經濟關係着手。恰好中共全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部更新現存工業企業的設備殊不可能，僅可逐步更換，故仍須蘇製設備與組件。(三)拉攏與強化所謂「健康力量」：蘇聯一貫相信，中共各機構內及領導階層中仍有不少人主張與蘇聯維持友好合作關係，這些人大多會直接或間接受過蘇聯的教育或訓練^⑨，蘇聯稱之爲「健康力量」。這些人在中共政壇上漸居要津，不少人被選入接棒當權的「第三梯隊」，其中最突出者是中共明日之星、現任副總理李鵬。去年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訪中共，以及今年戈爾巴喬夫破格會晤李鵬，其用意之一即在於此。(四)支持中共對臺灣的立場：蘇聯經常強調，它始終不承認任何形式的所謂「兩個中國」的概念，堅決支持北平的立場。去年四月二十七日蘇聯「消息報」以罕見的短文「臺灣島」闡述此點。(五)追求友好往來事：蘇聯喉舌，尤其是「莫斯科廣播電臺華語廣播」，不斷重述五十年代雙方友好合作的盛況及其成果。及至去年底，阿爾希波夫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在這方面也作出密集的反響。據中共描述，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時時流露念舊之情。因此，中共下結語說：「中蘇兩國人民友好的願望是無法抗拒的歷史潮流」^⑩。

中（共）蘇關係前景

中共與蘇聯基於內政與外交的需求，具有改善關係的共同意願，並曾就此點作過不少共同表白，最近一次是由戈爾巴喬夫與李鵬所作的^⑪。但是，中共認爲必須先消除三大障礙，雙方基本關係才可改善。因此，在中（共）蘇和解的道路上，對中共而言，有三個主要障礙；對蘇聯而言，祇有一個：那就是中共堅持消除三大障礙^⑫。

事實上，中（共）蘇關係已經在不斷改善，而中共對「消除三個障礙」的呼叫聲，已逐漸低弱下來。那麼，「三個障礙」在中（共）蘇關係正常化中究竟有什麼意義及作用？

在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過程起步之時，當中共提出消除主要障礙的條件時，中共自然明白，蘇聯在這方面是不可能讓步的。所以，中共提出這種條件必然另有用心，而最可能與最主要的圖謀是，藉著這個要求，中共可以在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爭取主動。

註^⑨ Raisa Mirovitskaya, Yuri Semyonov,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p. 49-50. 據該書所載，在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二年間，接受蘇聯訓練或教育的人數如下：技工八千餘人，研究人員九百多人，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家一千五百多人，高教人員一萬九千餘人，大學生與研究生一萬一千多人。

註^⑩ 朱敏之，「阿爾希波夫的中國之行」，「瞭望」，第二期（一九八五），第八頁。

註^⑪ 「戈爾巴喬夫會晤李鵬」，「消息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第三頁。

註^⑫ Gerald Segal, "Sno-Soviet Relations: th Road to Détente", *The World Today*, vol. 40, (May 1984), p. 212.

地位，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配合自己的外交政策調整其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速度。必要時，中共祇強調三個主要障礙的一個，或根本不提。甚至，可能會提出新要求代替舊要求。例如，一九六四年中共所提關係正常化的條件是，蘇共取銷其第二十、二十一及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以及蘇共「新綱領」等，而採納中共的「二十五點」提綱⁵³。如今，中共絕口不提此事。

此外，中共提出消除三個主要障礙的要求尚有其他用意。第一，漫天討價，以促使蘇聯在其他方面讓步。第二，降低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對中（共）蘇和解的疑慮。關於此點，也有事實可作根據。儘管華盛頓公開表示，不擔心中（共）蘇關係的改善，可是當今春中（共）蘇關係有明顯進展時，美國高級官員提醒中共，中（共）蘇間日趨親密的經濟與技術聯繫將使美國對中共的技術轉移發生問題。同時，華盛頓對中共在阿富汗及高棉問題上軟化立場，表示驚訝⁵⁴。無論如何，在目前的條件下，中共尚不欲因改善同蘇聯的關係而損及其與美國的關係。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尚不會輕易放棄消除主要障礙的要求。當香港記者問李鵬，中（共）蘇關係是否可以避免三大障礙而改善？他說，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⁵⁵。

另一方面，鄧小平說，「消除三大障礙尚需要時間」，但並不妨礙中（共）蘇在一些其他方面的改善和發展。最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論及中（共）蘇關係時指出，蘇聯對中共邊境安全的威脅是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對其他兩個障礙則隻字不提⁵⁶。種種事實顯示，中共消除「三個主要障礙」的要求，在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過程中，其工具性大於目的性。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三個主要障礙本身的嚴重性也逐漸弱化。首先看蘇聯在中蘇邊界駐紮重兵問題。第一，在中蘇邊界地區和遠東，蘇聯約駐有五十個陸軍師，其中二十一個師駐在濱海邊區（Maritime Krai），沿西伯利亞鐵道八個師，庫頁島（Sakhalin）三個師，堪察加（Kamchatka Pen）一個師，千島羣島（Kuriles Is.）一個師，外蒙五個師，沿中蘇邊境十二個師⁵⁷，比較起來，並不算太多。第二，蘇聯在中蘇邊境的部署旨在防衛，其在亞洲兵力的增加與其全國兵力總增長成正比⁵⁸。最後，蘇聯早已透露，願意酌減其在中蘇邊境的駐軍。這是三個主要障礙中唯一可以討論並可能獲得協議的一個⁵⁹。

註⁵³ R. Mirovitskaya, Yu. Semynov,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 66.

註⁵⁴ Nayan Chanda, "Superpower Triang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4, 1985, p. 17.

註⁵⁵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三頁。

註⁵⁶ [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頁；「胡耀邦答港澳記者」，[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第三頁。

註⁵⁷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第二頁。

註⁵⁸ Steven L. Levine, "Beijing and the Superpow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3, (November-December 1984), p. 84.

註⁵⁹ Ned Temko, "Senior Soviet Official Expects Eventual Thaw with Peking",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2, 1982, p. 13; *China News* (Taipei), April 8, 1985, p. 4.

蘇聯軍事佔領阿富汗這一事件曾使中共宣佈中止中（共）蘇關係正常化談判，但一九八二年十月雙方恢復磋商時，蘇聯並未撤兵，可見中共已作讓步。如今，蘇聯在阿富汗已深陷泥淖難以自拔，不但沒有對中共安全構成威脅，反而給予蘇聯一次重大教訓，形成一個牽制。在高棉問題上，中共要求蘇聯不要支持越南佔領高棉。而越南從高棉撤軍祇是時間問題，因為蘇聯與越南本身並不願長久佔領高棉。因此，越南與高棉問題的解決為期不會太遠^⑧。

總之，三個主要障礙的存在，在過去沒有、在未來也不會妨礙中（共）蘇關係的逐漸改善。易言之，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正在雙方協議的速度上緩慢而穩健地進展。量的漸變，終會導致質的突變。具體言之，中共與蘇聯的經濟、貿易、文化、科技等聯繫將不斷加強，「磋商」達到一定成就時，可能改為「談判」，談判級別也可能提高。談判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制訂一項作為雙方關係基礎的文件。政治關係改善後，雙方將試圖在新的基礎上改善黨與黨的關係。不過，由於時過境遷，重返五十年代初的「友好」已不可能；正如李鵬所說：「我們祇希望和蘇聯成爲一個友好的鄰邦，而不是成爲一個盟友」^⑨。

註⑧ Gerald Segal, *op. cit.*, pp. 207-212.

註⑨ 「姚依林、李鵬、田紀雲答港澳記者」，〔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三頁。

中共現階段經濟政策

自中共整肅四人幫後，經濟政策的演變，舉凡中國大陸之人口政策、人力資源，人民所得、生活水平、以及工、農、商、財經、外貿、科技、能源並生態環境等，本書均有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